

# 我们该以何种方式与传统对话

在现代世界、当代社会,我们是否已经与传统断裂?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与传统、古典时代对话?如今那些“国学热”中的乱象固然打着国学、国粹、传统文化的旗号,但由于对“传统对真理的内在要求”毫不知悉也毫无兴趣,因此不过是花样繁多的功利化、恶俗化、娱乐化后的“伪”传统方式。近一百年前,学衡派就倡导“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如今,在这一涉及现代性、中西古今之争、人文主义、保守主义、古典教育、古典学建构的重要领域,我们仍然一如当年吴宓批评的“新”学:五花八门、欺世骇俗、竞奇斗异,只是一时的时髦……当然,近现代以来,在哲学、美学、文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里,严肃地回望古典、与传统对话的学者、作家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以各种形式力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020年5月,青年诗人、批评家张定浩推出了沉淀、打磨十余年的力作《孟子读法》,他能藉此“重返历史现场”“直面今人困境”,乃至“变今之俗”吗?

和未未来之间的现世,设想到最糟糕的状况,也设想到最美满的时刻,然后无论如何,还是会继续认真生活下去。

## 鲁迅的“少看中国书”是有具体语境的

何同彬:鲁迅在古典学领域多有建树,如文字学、文献学、文学等,然而在那个1925年《京报副刊》青年“爱读书”和“必读书”的现代学术公案中,他和江绍原、俞平伯一起交了白卷,不但如此,他还着重强调:“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你如何理解鲁迅对于国学的态度?假如有人认为,你在《孟子读法》里面提到的很多伦理问题、哲学问题,西学都有对应的,甚至更科学完备的知识体系,我们为什么要回到孟子或儒家学说呢?或者,有人也许会说之凿凿地说,解决中国目前最紧迫、重要的问题需要的并不是国学或中国传统,而是西学,你怎么回应?

张定浩:鲁迅当时说“少看中国书”,是有具体语境的,那时候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西方现代思想;其次,鲁迅本人又是一直看中国书的。他反对的不是看中国古书这件事本身,只是以中国古书作为挡箭牌拒绝西方现代思想。而他反对的那个国学,我觉得也反对得毫无问题,那就是封建糟粕。鲁迅写《故事新编》,提倡儒墨侠,这都是从先秦古典精神中寻找支撑。先秦古典,儒家,国学,中国传统,这是几个完全不能等同的概念,只不过在那样的乱世,大多数人是无从作仔细耐心的学术分辨的,所以那种激烈的倡议,只能视作壮士断腕。但我们现在是可以有精力和能力仔细分辨的。鲁迅去世的早,我们不能妄断他四十年代之后的选择,但既然提到俞平伯,我们可以看到,俞平伯后来仍旧回到古典世界中。

如果有人问,解决现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需要西学来解决,那么,我就要问他,是何种西学?解决何种问题?我们假如从某一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学说出发去思考国家问题,你自然会得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就是这一种西方学说。这是一个把埋进去的东西再挖出来的逻辑循环而已。当然,我也不会主张解决中国问题就要靠国学,靠中国传统。因为很明显,是何种国学,哪一个传统?所有学问都是具体而微的,并不是处于简单的二元对立中。李零说过,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在孟子那个时代,并没有国学的概念,那有的是什么?我们要追问的是那个在概念形成之前的具体之物,以及那个具体之物落实到自己切身的具体情境中该如何面对?而不是把学问分成几个框框做选择。至于假设先秦儒家涉及的伦理、哲学问题,西学都有更完备的体系可以直接拿来用,那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被几千年中华文明影响过的中国人,你不可能把整个西方的两千年文明全部拿来吧。更何况,如果我们对于西学有更深入的了解,就会知道,最后你拿来的那个所谓完备的西学知识体系,其实已经是被西方当代哲人不断抛弃和反复质疑的,这又该如何是好?最后只能是所谓邯郸学步。

## 古典和古典主义是有差异的

何同彬:首先祝贺你的《孟子读法》出版,从《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到今天的《孟子读法》,也包括你讨论新诗诗人的著作,以及其他的批评文字,无论是内容、趣味,还是视野、方法,都能看出古典、传统在你的诗学世界、文学世界中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你甚至把Alphago的胜利看作是“古典人性”的胜利,也认为当代科学最前沿的认识和“古典精神”完全相通。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对古代诗人、古代典籍的兴趣,或者说你精神世界里的古典主义倾向,除了因为2008年之后受到张文江老师的影响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张定浩:我是在2003年前后去听张文江老师课的,那时候和黄德海在复旦住一个宿舍,他一个本科同学考取了张文江老师的研究生,他好奇跟着去听了听,听完对他同学说,你这个导师太好了,然后回来就拉我一起去听,我那时候都是思想共享。但我2004年研究生毕业后,因为工作等原因,就没有坚持去听,直到2008年才又厚着脸皮去听课。

如果说对古典主义的倾向,我想老师的影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是自己的心性。禅宗有“啐啄同时”的说法,过去《礼记》里也讲“有来学无往教”。我记得大学时就很着迷唐宋词,后来到复旦读研也按图索骥地补了很多古籍的课,但确实是一到张文江老师这里,才稍微找到一点门径或者是谱系,我记得最初听的是张老师讲《管锥编》,十部书囊括中国文化,那么回来之后就照着《管锥编》去读古书,边读边验证,虽然也没有完全读完,但至少心里大概有了一个框架。古典本来就不是和现代相对立的词,我们看当代西方很多现代、后现代的哲学家,没有哪一个是不读古书的,包括现在最火的福柯和阿甘本。

但古典和古典主义却是有差异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古典主义,具体可能是指十七、十八世纪的思想,就像我们说儒家或传统文化,其实往往指的是明清文化一样。西方的古典是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它相对于古典主义,正如先秦思想相对于明清儒家一样,都是思想的源头而非结果,“为有源头活水来”,是生机勃勃之处的东西,又对于人性有一种和现代思想迥异的严酷认知。

所以对我来讲,这个古典倾向其实除了心性之外,又是一个认知求学的必然结果。你读海德格尔、福柯、德勒兹、阿甘本,会遇到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你读鲁迅、钱钟书、张爱玲,也会遇到先秦诸子和《诗经》。但再进一步,你读了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会对孔子和庄子体认得更为亲切,因为所谓“轴心时代”的大哲学家都是相通的,这也是钱钟书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 很多作家喜欢用想象力替代文献爬梳力

何同彬:当前有很多当代文学领域里的作家、学人,都在以各自擅长的风格,在不同的领域、向度上孜孜以求地与古典对话,你觉得当代文学为什么有必要始终保持这样一种对古典、传统的关注、回望?当然,你们的这样一种“跨界性”的研究、写作,包括你在内,已经遭受了一些质疑(比如豆瓣上某些武断的否定),毕竟国学、古典学需要极其丰富、专业的文史修养,你自己也说自己的古典修养并不好(在我看来已经很好了),《孟子读法》是“在学习过程中写作”,但这样的学术性写作毕竟涉足的是专业领域,你有没有做好面对更多质疑的准备?毕竟目前还没看到特别专业、权威的学者对这本书做“标准”的学术评价。

张定浩:必须承认,很多当代作家写的有关古典领域的著作存在很多问题,他们很多时候是把古典现代化、简化,或者说自我化,所谓“我注六经”,从这些谈论古典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家,但不容易看到古典本身。我从写作这方面文章的最初,就希望能够避免这一点。而有可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就是多研读文献材料,尽可能完全地占有所涉及领域的材料,从基本材料到最新材料。但这并不是说要囊括各种冷门材料,以生僻考据为能事。鲁迅当年批评郑振铎治文学史的方法,说郑只知道搜集冷僻书和稀有书,但所谓史识和洞见是要能力从常见材料中提取的,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就完全用的是常见书籍。

我觉得很多作家之所以写不好古典,根本的一点还是读书太少,又喜欢用想象力替代文献爬梳力。这个和专业无关,专业是一个现代学院体制驯化的产物,你在学院工作过应该知道,很多专业领域的博导并不能配得上“专业”两个字。读书,做学问,最终是一种自我教育。孟子也没有读过博士,他自称是私淑孔子,什么是私淑,就是以某个人作为榜样来进行自我教育。我可以很不惭愧地说,关于《孟子》的基础文献,我都是经眼过的,《孟子》的每一节我都是仔细比对数十种文献,先倾听前人的讨论,再慢慢涵泳体会。我写这本书的宗旨也并不是要自我发挥,“立一家之言”,大凡当代治古典者打算立一家之言的,我觉得都要存疑,因为一不小心就会遇到一个欺世盗名者。我想做的,只是体会古典哲人的微言大义,辨析词句疑难,进而激发身心。你知道在古典注疏这一块,最令人丧气的是,你明白的地方,注家大注特注;你不明白的地方,注家也草草带过。我只是希望在这本书里尽可能地避免这一点,前辈已经说清楚的,我就少讲,别人语焉不详的地方,我就多说几句。

至于你说的豆瓣质疑,既然提到是“武断的否定”,那就不值得讨论。我最近在看奥尔斯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里面提到一

句,“今天的作家在他提笔着手处理一个他素有研究的主题时,他总得想到这样一个读者,其读书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从他这里学到点什么,而是要对作者的思想是否与自己大脑中已经存在的陈词滥调相一致做出判断”。《孟子》这一本书尤其明显,这仿佛是一本每个中国读书人都自以为读过的书,但很多人其实只是有意无意间被灌输了一些有关孟子的陈词滥调罢了。我当然不会拒绝任何质疑,只要他说得有道理,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私下里也收到过一些学者的反馈,都是正面的。我也很期待有专业学者来指正。

## 振作的底子就是对虚无的体认

何同彬:在谈到孟子对同时代失望的时候,你认为,“每一代的思想家,每一代人都会对自己的时代失望,但是失望之后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自我振作,一种是沉沦下去,我觉得这两种选择会一直持续下去。”就我的理解而言,《孟子读法》肯定在有意地教导我们振作,用你类似于施特劳斯的“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和种种‘今之俗’对抗”,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光亮的人”,从而让我们“周围的环境就会变得更加明亮一点”。你真的相信你的“对抗”能改变“周围的环境”吗?8月12日,你在豆瓣上发布了一首新的诗作《诗艺》,我觉得那首诗里有些虚无、自我怀疑的才才是真正的你,你不是一直在假装“自我振作”(笑),其实更倾向于“沉沦”?

张定浩:很多喜剧演员都有忧郁症,但这不代表他在台上说的笑话、演的喜剧就不好笑,就不能让人愉快。你要意识到黑暗的存在,对光的体认才会更强烈。谢谢你看到那首诗。我在那首诗里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在我身上一直存在的写诗和写文章的矛盾,写文章是可以看见一点一滴成果的,你慢慢找材料,研读材料,做笔记,慢慢形成思路,每天结束时你都会觉得有所收获;但写诗不是这样,至少对于我不是这样,写诗不是一个渐进式的工作。这些年我写的文章很多,但我内在一直希望可以多写一点诗,但写诗又那么艰难,所以常常又会逃避到写文章里去,我想表达的是这么一种纠结的情绪。我希望接下来一两年,可以不写文章,专心和虚无接触一下,写一点诗。

至于我自己的状况,我想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但从悲观开始可能才能感知乐观。所以这并不是假装振作,换句话说,我理解的振作的底子就是对虚无的体认,是意识到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之后自己会怎么办。孟子举过一个舜的例子,说舜早年窘困之时,他的态度是“若将终身”,就当一生就这样了,设想将来也就是一个平凡普通的正常人,也不会有怨气;但等到后来做了帝王,他的态度是“若固有之”,仿佛过去一直就是如此,这样就没有暴发户心态,非常从容。我觉得这种态度正是先秦儒家刚健有力的地方,就是永远在过去

对话



何同彬

青年评论家,《钟山》杂志副主编,现代快报《读品周刊》“读家对谈”栏目嘉宾主持



张定浩

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居上海。著有文论随笔集《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诗》《批评的准备》《爱与哀矜》,诗集《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等,最近出版有《孟子读法》。